

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幾個問題

楊允中*

一、理論與理論的形成

理論是人們對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規律性認識的集中體現，屬於社會精神財富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所謂理論，通俗的解釋是“人們由實踐概括出來的關於自然界和社會的知識的有系統的結論。”¹“系統化了的理論認識，具全面性、邏輯性、系統性的特徵。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離開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科學的理論是在社會實踐基礎上產生並經過社會實踐的檢驗和證明的理論，是客觀事物的本質、規律性的正確反映。”²人類社會經幾千年文明演進，對於社會發展的一些基本性規律已有比較豐富的寶貴積累，同時也依然存在一些急需認識但暫無結論性認知的探索空間。正因為如此，對於一些成熟的社會發展規律一定要加深必要的認知，對於一些似乎習以為常但卻需要進一步思考、探索的領域，則宜倡導敢為人先的創新之風。

理論是用來指導實踐的，理論的價值在於使人們對客觀事物具有更加科學準確的認知和判斷，因而可以順藤摸瓜、順手牽羊、順理成章地少走彎路、少受干擾；以盡可能少的投入獲取盡可能多的產出，以維護公正造福社會大眾，以滿足社會各界日益增長的發展要求。因此，在可能條件下，要設法加大探索力度，擴大理論的客觀性、科學性、系統性、前瞻性，不失時機地調整好觀察、思索、判斷能力，使自身的行為有所遵循、有所規範、有所選擇。這在一定意義上也可理解為社會領域的節能增效過程。“認識的前提是外部世界不依賴於人的意識而存在的客觀實在性和外部世界可知性。外部世界的客觀存在是認識的最終源泉，外部世界的可知性是認識的可能性的根據。”³人類的認識過程永遠不會終結，永遠不會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在實踐的基礎上，由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

維，再到實踐，這是一個具體的認識過程。而整個人類的認識發展過程，則是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往復的運動中實現的。”⁴所謂認識論，係指“探討人類認識的本質、結構，認識與客觀實際的關係，認識的前提和基礎，認識發生、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檢驗認識的真理標準等問題的哲學學說。”⁵“人作為認識的主體首先在於他是社會實踐的主體。認識不是離開實踐而在主體的頭腦中憑空地產生的，而是在社會實踐的客觀需要和實踐活動的基礎上發生、發展起來的主體對客體的一種觀念的或理論的關係。”⁶“認識是以客觀的社會實踐為基礎的，認識的內容來自客觀世界，認識的目的和任務是要正確地反映客體，獲得關於外部現實的精確的知識，從而有效地指導實踐，並通過實踐轉化為客觀現實，達到主觀和客觀、主體和客體的一致，這就是認識的客觀性。”⁷

作為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有五千年文明發展史的東方大國，作為經過改革開放後綜合國力空前增強的最大發展中國家，我們中國過去、現在都存在大量極富開發探索價值的理論陣地，都不缺乏有理論建樹的大師。中共十五大總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一個當代最富創新價值、最具挑戰性的重大理論課題，它內涵豐富，包容量大，也應該看成是幾代人的認識總結的昇華。儘管“中國特色”在某些方面還有舊社會遺留的痕跡，儘管在評估國家巨大變化和進步時不能不繼續保持足夠清醒與理性，但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這個全新理論體系，已足以讓國家全面進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已足以使海內外華人理所當然地開始成為受到尊重的平等一族。有國方有家，港澳兩地得以順利回歸正是祖國日益強大和認知體系日益完善的必然結果。

理論是認知的系統化、規範化、定型化。作為中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級研究員

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國兩制”方針，經鄧小平倡導與推動，經兩部基本法加以法制化具體化，如今已由“偉大構想”進入到正確實踐的歷史新階段。這是百分之百的中國首創，百分之百的中國思維，百分之百的中國智慧。

澳門被歷史選中成爲驗證“一國兩制”新理論、新思維的示範區，無論特區政府還是特區居民都是歷史的幸運者——成爲正確實踐“一國兩制”有效載體。澳門的地位、功能十分突出，澳門的價值、作用十分重要。可以講，澳門是“一國兩制”理論的前沿陣地，澳門居民都是實行“一國兩制”的行爲主體，而澳門學者更應成爲“一國兩制”理論的有效載體。在澳門所發生的一切，無論從政治、法律，還是經濟、民生，以至社會、文化方面觀察，都是特別行政區制度下依法施政的結果，都直接和國家的發展進步構成正相關，都是實踐“一國兩制”的實際推進過程，也都同政府、社會的同步開拓努力分不開。所有成功都可歸結爲“一國兩制”方針正確，所有不足都可理解爲新生制度尚待完善。故此，要讓澳門特區展示出更高的驗證、示範成功率，就要進一步提升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認知的自覺性，特別是要在一些規律性問題上及時作出回應、作出配合、作出選擇。這是歷史“降大任於斯民”。

二、關於認識論的兩大核心理念

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和衷共濟的和諧世界觀，求同存異、兼容並蓄、融會貫通的互補共贏新思維，陰陽互濟、剛柔並重、內外兼及和兩手策略，這是中華智慧、東方文明在新時代、新形勢下的全面展示，這是華夏子孫淵遠流長、根深蒂固的科學世界觀和辯證認識論的升華。

（一）知行合一

所謂知行合一，亦即知行相統一的觀點。“知”即知識、認識的意思；“行”即行動和踐履。中國學者向來主張，知行統一觀就是關於認識和實踐相統一的理論、學說，認識和實踐的關係就是知和行的關係。傳統哲學的知行觀具有鮮明的倫理特點，哲學家討論知行問題，多從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爲的關係立論，主要是指個人的道德踐履和道德修養，但其中也包含着認識論上的意義。近代，知行問題逐漸擺脫了古代的樸素性，具有了一般認識論的意義。爲了鼓動人們起

來推翻滿清，孫中山提出“知難行易”說，賦予“行”的概念以革命實踐的內容。毛澤東更加強調“行”即實踐的作用與意義，規定了知行範疇的科學內涵，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經驗，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哲學史上關於知行關係問題的有價值的成果，採用中國哲學的傳統術語，把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概括成知行統一觀。其實，不知不行、不行不知，有時先知後行，有時先行後知，程序上都是必要的。因此，從整個中國哲學傳統來講，辯證唯物主義的知行統一觀，既是中國樸素唯物主義知行統一觀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也是中國哲學史上關於知行問題的科學概括和總結。要在20世紀末之前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這是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知”，要用一種嶄新思維、雙贏模式有效地解決香港、澳門的回歸，這是新時代對中國人民要求的“行”。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根據國家多年來正反經驗的總結，及時推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歷史命題，恰到好處地解決了知與行的關係，他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百年不爭論”、“三個有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等科學判斷充滿哲理、充滿智慧，僅僅30多年的奮發圖強、艱苦奮鬥便徹底改變了國家“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並使之逐步步入大國俱樂部、強國俱樂部的舞台。這是知行合一科學認識論的成功，這是中國自身發展經驗的成功，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導向的成功。

（二）求同存異

這是一個大思維，一個既通俗又深奧的大道理，一個講來容易做來難的老問題。其邏輯重點是指找出共同點，保留不同點，力求以同化異、以異促同，做到和平相處、優勢互補。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便倡導“和爲貴”、“和而不同”，這是中華文明、東方智慧的體現。在人類社會中，由於利益、願望、興趣、愛好之不同，存在某些不同的觀點、想法不足爲奇，但本着互相依存、互補優勢的理念，應在大原則、大方向、大目標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適度保留、尊重某些不同要求，既求大同又存小異，這種做法是有益而有利的。事實上，“一國兩制”理論的思想淵源與求同存異思維密不可分。不同國家之間歷史遺留的問題可以用非和平手段解決，也可以用和平手段解決；可以用激進的強硬手段解決，也可以用理性化的智取模式解決。惟求同方能提升共識，擴大合作面，整合競爭力；惟存異方能突顯多彩世界，也不埋沒任何獨到見解。一方面，這種做法有利於團結大多數，另一方

面，這種做法也有利於尊重少數，因為有時少數可能是正確一方。求同存異有助於互補共贏，防止內訌和外鬥，促進和諧共融、取長補短，大至國家施政，小至個人關係都是一個務實選擇。

進入特別行政區全新發展階段，特區政府官員也好，社會各界包括學者也好，都應學會用文明、理性同別人對話，學會用永無止境的追求與探索來拓展自身的“一國兩制”事業。

（三）和諧主題

中國千百年來世代相襲的文化傳統中，包括“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大愛無疆”、“和諧共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不戰而勝，以智取勝”等文明理念。這中間，“知行合一”與“求同求異”又是兩大核心價值觀，兩個蘊育極大力量源泉的成熟認知體系，同時也是“一國兩制”理論得以最終正確形成的思想淵源。面對新形勢、新時代，進一步做好認知與心理調整，對於國人以及特區居民都是不容放鬆的一項發展要求。

“中華文明在世界不同文明對話中，應該而且必然有所作為，有所貢獻。這是因為，中華民族向以極大地包容、注重和諧、酷愛和平著稱；我們有着保證了中華民族獨樹一幟地保持幾千年一統和穩定的文明因素和豐富經驗。”⁸“中華文明的內涵，的確有許多可以作為其他文明的參考，用來補充、糾正、制衡現在統治着全人類的西方文明，以便人類在未來共同創造出能夠真正促進自身進步、保障地球安寧與和諧的新文明。”⁹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已成功地走向世界，世界各個板塊也爭相向中國靠攏。在中國與世界互動過程中，以廉價勞動力維持的產品出口優勢即將淡化，以知識、技術、專利逐步形成的新競爭優勢將大放異彩。這是兩個不同發展階段的主要特點。早在三十多年前的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即作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發展主旋律的判斷，20世紀90年代末中共十五大又作出直至21世紀前20年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這中間貫穿一條中華文明對和為貴、人類自身和諧以及與自然界之間保持和諧的崇高理念和科學認知。“第三個階段是智慧的貢獻，就是把我們五千年文化的精華——世界觀或者叫宇宙觀、倫理觀、審美觀等等，讓世界人民知道，供他們參考。”¹⁰

我們的願望和追求的目標是建立包括和諧在內的新型社會關係，也包括新型的國際關係。因為和諧體現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係民

主化；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進經濟全球化，朝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戰爭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¹¹

三、“一國兩制”理論基本內涵與學科歸屬

（一）“一國兩制”理論基本內涵

1. 國家主權觀，即一個中國理念

我們的國家是統一而完整的東方大國，中國版圖既包括作為國家主體部分的大陸，也包括台灣海峽對岸的台灣地區，當然也包括因歷史原因一度淪為外國管治的港澳地區；既包括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且在改革開放後綜合國力迅猛提升的國家主體部分，也包括實行資本主義且在經濟、民生領域取得較好成果的局部地區。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逐步實現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和利益所在，國家對港澳先後恢復行使主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2. 兩種制度共存觀

國家憲法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是基於歷史和現實，基於國情和區情，基於全國人民意願和港澳兩地居民意願。事實有力地證明在國家主體部分繼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在局部地區靈活實行該地區原有社會制度是利於有益的，這意味着特區可以充分利用原有優勢，也可有效利用國家支持的“一國兩制”優勢，從而使兩種制度的優勢可以在特區得到整合。

3. “澳人治澳”觀

和“港人治港”一樣，“澳人治澳”表明特別行政區公權力的行使以本地人特別是本地人中的中國公民為主體，這是國家恢復行使主權後的一個特殊要求，也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具創新價值的制度安排。十多年實踐“一國兩制”的歷史證明，澳門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好發展好建設好澳門。

4. 高度自治觀

基本法規定，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

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除直接體現國家主權的外交、國防外，特區幾乎在所有領域都可有效行使管轄權，在司法領域更可行使終審權。這是迄今為止實行地方自治的最新做法、最高水平。

5. 政策穩定觀

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從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宣佈“一國兩制”政策五十年不變到兩部基本法確認的五十年不變的終結期共約七十年，相當於正常情況下的三代人成長與開拓期。經法制化的這項政策指引亦屬中外歷史所罕見。而且可以預見的發展趨勢是“一國兩制”現在是不應該變，以後是不需要變。其宗旨、目標就在於在科學地認定形勢特點前提下使“一國兩制”這一體現當代文明成果的制度創新得以不受干擾地貫徹始終，取得全面成功。

6. 長期示範觀

作為基本國策，“一國兩制”在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十多年實踐已展示出極強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它已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可分割的重要內涵。充滿生機活力的特別行政區既有力地確保自身的繁榮穩定、寬鬆和諧，又積極促進了兩岸關係的持續改善。澳門經濟民生指標的巨變更驗證了“一國兩制”科學性、合理性與可行性。因而，可以毫不誇大地講，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存在與發展，已成為觀察整個國家發展進步、逐步走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晴雨表和指向儀。香港和澳門，作為國家的兩顆掌上明珠必將進一步散發出奪目光彩。

(二) “一國兩制”理論：在實踐中發展

隨着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並相繼建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正確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確保兩地長期保持繁榮穩定已及時進入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議事日程，也是特區居民本身的歷史使命。“一國兩制”直接關係到國家的深入改革開放和民族偉大復興。“‘一國兩制’事業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祖國內地共同發展繁榮的事業，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¹²因而，對“一國兩制”理論，對基本法的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就成為國家和特區一項十分突出而迫切的重大課題。

早在2004年12月，胡錦濤首次前來澳門特區視察時便指出：“‘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在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按照‘一國兩制’方針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澳門兩個特別

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央政府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同樣也是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面臨的嶄新課題。”因此，“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廣大香港同胞、澳門同胞，都需要在貫徹‘一國兩制’的實踐中積極探索、不斷前進。”¹³要對“一國兩制”、基本法進行深入系統研究已成為國家領導人反覆強調的一個重大課題。2007年6月吳邦國指出：“隨着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基本法在實施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深入實施基本法的同時，需要本着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進一步加強對基本法的研究，認真總結幾次釋法的經驗，及時解決基本法實施中遇到的問題，不斷豐富基本法的實踐，把基本法貫徹好實施好。”¹⁴2009年12月吳邦國再次指出：“隨着澳門社會的發展，基本法實施中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情況。我們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同時，要加強對基本法的研究，認真總結基本法實施中的好經驗好做法，研究解決基本法實施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豐富基本法的理論和實踐，把基本法貫徹好實施好。”¹⁵

吳邦國還進一步指出：“撫今追昔，是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偉大構想，親自領導制定對香港、澳門的一系列基本方針政策，開闢了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切實可行道路，指引着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前進方向；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妥善應對各種複雜矛盾和挑戰，進行開創性的實踐，確保了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使‘一國兩制’從科學構想變成生動現實；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往開來，與時俱進，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作為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¹⁶“實踐充分證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國兩制’方針，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重要組成部分的祖國和平統一道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¹⁷長期主持香港、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工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喬曉陽副秘書長指出，“‘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對世界和人類文明的眾多貢獻中的又一項偉大貢獻，為世界解決這類問題提供了新的思維和典型範例。”¹⁸“‘一國兩制’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典範，是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的典範，充分體現了求同存異、開放包容精神，充分體現了和平和諧、合作共贏

的思想。因此，‘一國兩制’不僅是一個極其豐富的政治學、法學理論寶庫，也是一個極其豐富的經濟學、哲學、文化等理論寶庫，值得我們認真挖掘。”¹⁹

(三) “一國兩制”首先屬於憲法學、憲政研究課題

“一國兩制”產生在當代中國，也發展在當代中國。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十多年實踐“一國兩制”已積累了初步經驗，已走上各自適用的發展路向。現在擺在港澳人士面前的突出課題，已不再是對“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理解與討論，而是對自己驗證“一國兩制”經驗、問題、教訓及時作出清醒明智反思和總結。特區的人和事都可以用“一國兩制”加以定性和分類，順暢的成功的方方面面當然是“一國兩制”科學性、生命力的驗證成果，不順不暢的，不被認定是正面成功的問題、矛盾，也宜用“一國兩制”加以驗證：或是對基本國策缺乏認知所致，或是制定已約二十年的基本法某些規定存有再認識的必要，或是善良人們不想見到的某些不測因素所使然。

從學科範圍、研究對象觀察，“一國兩制”首先是憲法學理論的最新內涵，也是憲政發展的一個突出關注點。目前憲法已有三個條文進行指引，即第 31 條、第 62 條、第 59 條。實際上，“一國兩制”也是現代政治學需要重點研究的一大課題。它涉及國體、政體等政治學核心概念。當然，“一國兩制”也可理解為一個綜合性、跨學科理論課題，甚至也可界定為一個新型具大覆蓋面的交叉學科，除憲法學、法理學、國際法等法學範疇以及國體、政體、行政主導等政治學、公共行政學範疇外，它還要求歷史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文獻學、人類學，以至媒體學、美學、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予以認真關注。

(四) 對“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認知

首先，這是業已成熟的新型理論體系。它不僅涵蓋面廣，創新價值高，影響力深遠，而且自成體系，吸引越來越多直接相關或間接相關學者樂此不疲地投入奉獻，開拓完善。它產生於中國特殊社會環境，植根於體現東方文明的古老華夏認識體系與傳統文化，經國家領導人積極倡導、定位已獲國人與世人廣泛認同，而且經兩個特別行政區逾十年實踐驗證正確而可行，具有巨大生命力與優越性。

其次，它標誌着新型政治發展模式的初步成功，既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又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既令原有社會經濟制度與生活方式保持不變，又為體現

“一國兩制”方針的新政治體制、新運行機制、新施政理念得以全面啓動作出引導，現新興特別行政區制度已全面投入運行且已展示出無比生命力、競爭力。

再次，這是認識論、方法論的一大突破。求同存異、互利共贏，這是千百年人善良人的熱切追求，如今得以形成制度化、規範化的發展環境和約束機制。在這一機制下，自由表達、公平競爭、主動參與逐漸成為常態。人們在現實中也進一步理解到求大同存小異、寬鬆包容、人人均有直接參與機會的大環境的重要性。特別行政區的出現，不僅改變了傳統中國人、東方人的思維定勢，而且也以活生生的事實令全球有識之士為之震驚。

總之，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史上不曾有過的記錄，正因為它是多重創新，半個世紀之前不僅沒人做過，甚至也無人敢於想過；不僅特區官員、居民沒有做過，國家領導人也未曾做過。故此，在實踐過程中即使出現一些人們不想見到的甚至是負面現象，絕對不需大驚小怪：該依法處理的就依法處理，該存在改善空間的就認真加以改善，不過如此。儘管“一國”的優勢與“兩制”的優勢相加，足以抵禦任何風險與挑戰，人們還是不宜助長依賴心態，不能不保持足夠的防微杜漸、未雨綢繆的良好心理素質，未來要做的事着實不少。“‘一國兩制’不僅是對人類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不僅是憲法學、行政法學，而且是法理學等各個法學領域）提出了重大挑戰，而且也是對經濟制度和經濟學理論、哲學思想和人的思維方式等都提出了重大挑戰。”²⁰ 作為具備一定思考與判斷能力的官員、專業人士，都要作出承諾、作出回應，越來越清晰的一點是，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國情、中國特色、中國智慧、中國創新；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現代化、成熟化；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與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規律；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學者思維體系自我完善的必要途徑。

四、關於特別行政區制度

20 世紀末在中國版圖上出現的兩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不同於一般行政區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

度。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其主體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為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容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表明了特別行政區是國家原有建制省、自治區、直轄市之外新建立的新型地方行政區域，實行不同於單一制國家原有的制度。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第 62 條又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這些規定為設立特別行政區提供了憲法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11 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這表明特別行政區制度包括：①社會經濟制度；②有關保障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③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制度。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構想的具體化，作為特區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效力的根本大法，全面規範了特別行政區制度，已就特別行政區的性質、法律定位、權力來源、特別行政區與中央的關係、居民基本權益的保障、政治制度、經濟與文化制度、對外交往制度等領域作出了原則性規定與指引。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不可分割的領土，直接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下的地方行政區域；在權力來源上，特別行政區享有法律賦予的高度自治權，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並確立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與立法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的可稱為“行政長官制”的政治體制；在權力分工上，與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防、外交等事務統一由中央政府管理，其他方面屬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範圍；在權力行使上，特別行政區由當地人管理，必須以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中國恢復行使港澳的主權，不損害港澳的繁榮和穩定的愛國者為主體；在自治程度上，特別行政區享有包括終審權在內的高度自治權，不僅比回歸前大大地超越，而且比中國一般地方行政區域和民族自治區域享有的權利廣泛得多；在自主管理上，特別行政區可以自行制定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政策，保持財政稅收獨立，保持國際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地區地位，可以特別行政區的名義保持和發展對外的經濟和文化關係網絡，繼續發行自身的貨幣，負責維持本區域內的社會治安等。

這裏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特別行政區制度作

為中國憲政發展的一項獨特制度創新且至今已有兩個特區長逾十年實踐驗證，理所當然地應被認定為中國原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共領導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之後另一個基本政治制度。已經被定型為基本國策的這項“一國兩制”基本政治制度，絕不是消極應對而是積極創新；絕不是無可奈何、無原則讓步，而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主動安排；絕不是損害國家核心利益，而是有效維護國家核心利益。

中國現有的兩個特別行政區，分別是 1997 年 7 月 1 日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和 1999 年 12 月 20 日成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它們是根據鄧小平“一國兩制”方針而創設的，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允許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特別行政區的外交、國防事務，並按上述兩部基本法規定任命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主要官員。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即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特別行政區政府以行政長官為中心，實施由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組成的全新政治體制，並實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政策。

特別行政區設立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實現祖國統一。設立的法律依據有兩個方面的法律淵源：一是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和第 62 條第 13 項規定全國人大“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二是中英、中葡關於香港和澳門問題的兩個聯合聲明。但無論以哪一種法律淵源表現出來，都以“一國兩制”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和政治基礎。而港澳兩部基本法是憲法第 31 條的具體化、規範化，也是特別行政區長治久安、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特別行政區制度無疑是一個既體現“一國兩制”方針又體現中國悠久文化傳統的全新基本政治制度。也正因為它新，是制度創新成果，就要求人們在實踐中加深對其正確理解，在實踐中提升實踐水平。

五、關於“一國兩制”文明

這是一個大課題，但又是一個十分現實的課題。如果是非特別行政區居民，站在特區之外進行觀察、

進行思考，那麼還可以原則性一些、抽象化一些。但特區內部人士，包括官員、學者、居民，整天生活在特區，整天接觸的都是特區現實。特區發展進步，我們都有份參與推動；特區發展成效，我們也都有份分享。或者講，特區好的地方我們都樂見其成；特區現存問題，我們也期待及時得到解決。

2006年，本人曾以《全面開創“一國兩制”文明——時代的召喚》為題寫過一篇文章，談及“富強、民主、文明，這是人類進步的共同性目標，社會均富化、民主法治化、文明時代化，尚需不同國度、不同發展水平的人士繼續奮鬥爭取、探索開拓。作為袖珍型社會的澳門特區，絕對有條件成為展示‘一國兩制’文明的示範基地，成為綜合素質持續提升的先進地區。重要一點是，要進一步營造開放法治、民主平等、公平競爭的寬鬆兼愛社會環境，進一步提升尊重人才、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勞動創造的社會共識，令以民為本、民主法治等基本理念和原則，在各級執政者的頭腦裏真正佔有一席之地，也令一切有志者樂於無怨無悔地去開拓追求，令社會資源得以有效地開發利用，令對富強、民主、文明這三大發展目標的追求變成廣大居民的自覺行動，這樣的社會就充滿活力，就大有希望。”²¹

其實，“一國兩制”文明理應屬於政治文明範疇。政治文明係指“人們改造社會所獲得政治成果的總和。一般表現為人們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中關於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實現程度。”²² 政治文明的內容包括國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方面。政治、法律、民主制度三者彼此聯繫，相互溝通，協調發展，構成了政治文明的統一體，其中，國家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通過社會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主制度的推進，人們的民主、自由、平等權利實現的程度相應獲得新的提高，這就是政治文明的進步。政治文明是個動態性概念，它既可以意會又可以言傳，因為制度和制度可以對比，人與人也可以對比，一經對比就可發現彼此間的差距，孰優孰劣、孰先孰後，一清二楚，一目了然。政治文明事關領導人治國理政的成效，也事關廣大居民的基本權益。故此，倡導政治文明，是社會進步、民族成熟的標誌。“我們必須在基本法指引下，有策略、有步驟地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首先實現現有條件下的民主因素最大化，並用機制民主促進體制民主，從機制民主培養出初步民主生態，最終實現全面的體制民主化。”²³

人們追求的文明社會，首先應該是個國富民強的發達型社會，這是保持居民綜合生活素質不斷提升的

前提和基礎。文明社會也應該是個民主型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既有完善的法制保障體系，又有普遍建立的健全的法治意識；既有很高的政治認同又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意願。文明社會更應是個和諧型社會，既有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又有社會成員之間的和諧；既有政治理念的和諧又有經濟利益的和諧；既有高效運行的和諧又有生態環境的和諧。“一國兩制”作為一個根本性的政治理念和最基本的法制理念，已成為特別行政區活生生的現實。人們所以沒有保留地接受它、支持它、擁護它，是因為它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代表了廣有居民的共同願望和要求，體現了極大的包容性和寬鬆度，也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優越性。“一國兩制”是特別行政區政治發展模式，也是新時代特區發展與建設的總體要求，它涉及物質領域建設，更涉及精神領域進步；涉及政權的穩定，也涉及居民綜合素質的提升。

特別行政區，特就特在它是根據“一國兩制”原則、根據憲法的特別授權而建立，特就特在它是按照全面體現“一國兩制”原則與精神的基本法進行自我管理，即實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特就特在它不實行國家主體部分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這意味着它可以把國家優勢和自身的優勢合理地組合成更具生命力與競爭力的“一國兩制”優勢。作為東方地平線上出現的兩個“一國兩制”有效載體之一，澳門這些年來，政通人和、百業興旺、和諧寬鬆、生機盎然，變得更美更強，更和諧更進步，因而理所當然地受到全國人民以至國際社會的熱切關注和普遍肯定。

“‘一國兩制’是當代最高政治思維的體現，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東方智慧的結晶。它既是特區依法施政的理論基礎，又是全面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最佳模式，它既是特區以至全國人民都要堅持的基本理念，又是有待學術理論界深入系統探索研究的一大綜合性課題。”²⁴ 正確實踐“一國兩制”是特區政府和廣大居民的一項莊嚴歷史使命，而“正確實踐”顯然是有其客觀標準的，“儘管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觀察判斷的角度不同，對於‘一國兩制’、基本法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但重要的是：①任何理解都必須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創構想，亦即必須符合基本法立法原意；②必須同國家恢復行使主權的需要相一致，也不可同澳門社會實際相脫節，亦即要符合社會前進的需要和廣大居民的整體意願；③不可違背改革開放以及國家和平統一和民族偉大復興的遠景目標。”²⁵ 因此，提升政治認同度、擴大政治參與面、

普及政治道德、建立正確的政治價值觀、堅持政治行為理性化、培育高公民意識的現代文明載體等方面，自然成為當前理論界的重要關注點。

六、幾句小結

“一國兩制”制度化既是祖國強大的必然結果，又是認識論在新形勢下昇華的產物，這是新型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的成功，是知行合一、求同存異、辯證統一認識論的成功。“一國兩制”的正確實踐，已為澳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方面的巨大變化，已令廣大居民嘗到了甜頭，收到了實惠。“一國兩制”的理論正確性和現實可行性，經過澳門特區初步實踐已得到了全面的、富有說服力的驗證。“一國兩制”作為嶄新理論與發展模式，本身也需要在實

踐中提升實踐水平。可以充滿信心地說，通過“一國兩制”文明建設和居民公民教育的普及，澳門特區這個新生的政權形式必將不斷得到完善，其驗證、示範效應必將不斷擴大並受到廣泛認同。

如今，“一國兩制”理論經港澳兩部基本法的法制化規範化，經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長逾十年的實踐積累，已經成為現代憲法學、政治學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份。這是植根於中華文明的一項理論突破，這也是令國人引以為榮、令世人為之震驚的一大制度創新。雖然前行航程上還會有風有雨、有波有浪，但相信承載“一國兩制”驗證成效的特區大船定能繼續滿帆前行，特別行政區制度及其優越性定能得到進一步展現。故此，深入而系統地研究“一國兩制”理論及其實踐規律，便是當前有待全面加強的一大活動領域，願大家共勉。

註釋：

- 1 見《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835-836頁。
- 2 見《辭海》(第五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第1349頁。
- 3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精粹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第1186頁。
- 4 同上註。
- 5 同上註。
- 6 同上註。
- 7 同上註。
- 8 許嘉璐：《做好與世界文明對話的準備》，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0年11月23日，第1版。
- 9 同上註。
- 10 同上註。
- 11 見《辭海》(第五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第867頁。
- 12 胡錦濤：《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憲政法律文獻匯編》(增訂版)，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第228-231頁。
- 13 胡錦濤：《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五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憲政法律文獻匯編》(增訂版)，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第225-227頁。
- 14 吳邦國：《深入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把“一國兩制”偉大實踐推向前進——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十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憲政法律文獻匯編》(增訂版)，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第232-239頁。
- 15 吳邦國：《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十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憲政法律文獻匯編》(增訂版)，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第240-245頁。
- 16 同上註。
- 17 同上註。
- 18 喬曉陽：《深刻理解“一國兩制”的偉大意義》，載於許崇德主編：《“一國兩制”知識叢書》之序，北京：中國民主法

制出版社，2009年。

¹⁹ 同上註。

²⁰ 同上註。

²¹ 楊允中：《全面開創“一國兩制”文明——時代的召喚》，載於楊允中：《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09年，第154頁。

²²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第504頁。

²³ 何厚鐸：《2006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2005年11月15日，第28頁。

²⁴ 楊允中：《論正確實踐“一國兩制”》，澳門：澳門研究中心，2005年，自序。

²⁵ 同上註。